

· 中国当代文论问题与反思 ·

[主持人的话] 本期所发三篇论文围绕文学与政治关系立论,以文学政治化现象作为直接的研究对象,从中观察各自的特点,分析各自的内容,以为建构文学政治学的一种材料与借鉴。

《1960年代初:文学弱政治化的理论策略及功用分析》探讨的是一个独特的时期即1960年代初期,此时正是中国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的调整期,反映在文论上当然具有调整的特性。但论文主要不是研究文论发展与时代发展之间的同步性,而是着重分析这种调整的具体实施方案与步骤,名之曰调整策略,是想往问题如何解决如何落实的方面说。这样的观察,能够明晰1960年代初期实现文学弱政治化的真正方法是什么。论文从知识分子的政策调整、文论教材建设与西方文论著作引进三个方面研究了这些策略的有效性,分析文学回归审美性的积极成果,进而指出这些调整策略所富含的思想力量,也在某种程度上开启了1978年以后文论界的思想解放与审美意识的确认,是新时期文论的源头之一。这说明1978年后的文学去政治化正是1960年代文学弱政治化的强化形态,前因后果,于此一目了然。

《“全新中国”的文学想象——对毛泽东〈讲话〉的一种解读》将毛泽东关于民族国家想象与其文学想象结合起来研究,将政治文本《新民主主义论》与文论文本《讲话》结合起来加以对照分析,有利于揭示文学想象与民族国家建构的内在一致性,也揭示出毛泽东的文论作为其政治想象的派生物,必然具有内在的政治本质。这一方面扩大了文论文本研究的领域,另一方面也丰富了政治文本研究的领域,从文本互证的角度,为文学政治学建构提供了一条新路径。

《身份政治与后殖民主义文论》一文研究西方当代的政治批评,借身份政治证明了在文学领域中从事政治性的观照,其视角、内容可以极为丰富。而在当代,研究文学与殖民主义之间的错综关联,借此说明后殖民主义文论具有鲜明的实践性、批判性和政治性,再次强调了文学与社会现实政治的紧密关联,由此可以洞悉当代人类生活的紧张与复杂。当然,一味地对文学进行政治分析而不考虑文学的特性,只将文学当代政治文本而不重视其作为审美文本的首要特征,并不利于科学认识文学现象。所以,在讨论文学与政治关系时,如何为这一讨论设置一定的文学界限或者审美界限,是非常必要的。文学政治学的建构具有两种主要形态,一种是立足于政治视角的文学政治学,一种是立足于文学视角的文学政治学,后者应当是文学政治学的主体部分,这才体现了文学政治学作为学科的基本属性。

[主持人简介] 张永清,男,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锋杰,男,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 1960年代初:文学弱政治化的理论策略及功用分析

尹传兰<sup>1</sup>, 刘锋杰<sup>2</sup>

(1. 牡丹江师范学院 文学院,黑龙江 牡丹江 157011; 2. 苏州大学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摘要] 在20世纪中国文论史上,1960年代初曾出现过文学弱政治化的走向,党的宣传部门所采取的理论策略是:重

[收稿日期] 2012-06-10

[基金项目] 本文为苏州大学“卓越人才培养计划——博士研究生学术新人奖”(5832004211)、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艺政治学的创构——百年来文学与政治论争研究”(07BZW012)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尹传兰(1972—),女,黑龙江鸡西人,牡丹江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苏州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论研究;刘锋杰(1953—),男,安徽泾县人,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艺学研究。

新厘定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规划编写具有新意的文学理论教材、大量引进西方的各派文艺理论,从而为探讨文学的规律性提供了相对宽松的环境。这表明1960年代仍然出现了文论创新的努力,而其作为一种学理源头,直接影响了1978年后新时期文论的发展。

[关键词] 1960年代;文学弱政治化;理论策略;调整

[中图分类号] I0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2273(2012)04-0005-09

在20世纪中国文论史上,1970年代前显现出越来越强烈的文学政治化的认识趋向,至“文革”时期进入极端化状态。但在1960年代初,却出现了弱政治化走向,具体表现为:由强调“为工农兵服务”扩大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开始承认知识分子的“人民”属性;出现了“反题材决定论”,否定题材决定作品价值的观念;提出“写中间人物”,将中间人物与工农兵英雄同样列为可创造的文学典型,扩大了文学表现的对象。这是在重新探讨文学的独特发展规律。诚如周扬所说:“任何事物都有规律,政治有政治的规律,经济有经济的规律,文学艺术也有自己的规律,而且客观规律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不以任何阶级、集团或政党的意志为转移的。违背客观规律,好心也可能办坏事。我们要采取学习和总结经验的态度,研究文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sup>[1]17</sup>1960年代初文学弱政治化的论述,是寻求文学规律的一次小心翼翼的努力。在这个探索过程中,新侨、广州和大连会议的相继召开,成为调整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政策保障,其中关于知识分子属性的重新厘定、文科教材的编写、西方文艺理论的译介则是促成弱政治化的主要理论策略,从而为探讨文学的规律性提供了相对宽松的环境,由此开始质疑文学工具论,也为“文革”结束后实现文学研究的“向内转”提供了理论基础。本文将就文学弱政治化的理论策略及功用加以分析。

#### 一

1960年代初文学弱政治化的理论策略之一是重新定位知识分子,弱化了对于文学的政治干预。

中共对知识分子的定位一直随着政治、经济政策的变化而变化,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在波峰谷底间颠簸着。建国初主要对知识分子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要求知识分子从为旧社会服务转变到为新社会服务的轨道上来。作为被“教育”和“改造”的对象,知识分子不停地检讨和批判自己的超阶级思想,找出与工农兵的情感差距。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而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知识分子的重要性得以凸显。从1956年起开始制订一系列知识分子新政,重新厘定知识分子的阶级属

性,意在纠正以往对于知识分子的评价不高,恢复知识分子在建设中的作用。1956年1月,周恩来明确宣布,中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sup>[2]162</sup>。同年2月24日,《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指出,知识分子的基本队伍已经成为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并批评党内存在着“不把他们当作自己人,不用同志式的态度同他们共同工作”的错误倾向。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知识分子又被划归资产阶级范畴,认为他们是“同无产阶级较量的主要力量”。在划定的55万名右派分子中,知识分子占了57%左右。随着1961年经济建设调整时期的到来,又论及知识分子的定位问题,从而构成重新认识与接纳知识分子的“三步走”:首先,表现知识分子的呼声,以此作为民意基础,为引出知识分子新政做铺垫。聂荣臻在《关于当前自然科学工作若干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中就指出,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存在着价值低估、政策不全等问题,而其得到的指示认同了这一点:“做好知识分子工作,很关紧要……近几年来,有不少的同志,在对待知识、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上,有一些片面的认识,简单粗暴的现象也有所滋长,必须引起严重的注意,以端正方向,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政策……目前有必要强调对知识分子的团结和使用问题,以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知识分子,使用一切有用的力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其次,要求转变观念,做好具体纠错工作,重新凝聚知识分子队伍,指出:“在反右派斗争以后,各单位对一些知识分子进行的批判,要加以清理……凡是批判错了,或者有一部分错了的,都要甄别事实,分清是非,纠正错误,由党的负责干部采取适当方式向他们讲清楚,戴错了帽子的要摘掉,以利于解除思想疙瘩,发扬民主,增强团结。一定要使知识分子敢于讲真话,畅所欲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sup>[3]515</sup>调整知识分子政策最重要的表现就是为知识分子“摘帽”。1961年11月,中宣部的内部刊物刊载《中南一些知识分子认为党给他们“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的文章提到:“大家对陶铸在会上提出的‘今后一般的不再叫他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最为高兴,认为党已经给

他们‘摘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sup>[4]</sup>最后,确认知识分子属于劳动人民,彻底解决知识分子的定性问题,以免再次出现打压现象。1962年3月,周恩来参加广州会议发表讲话,重新肯定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劳动人民,“十二年来,我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已有了根本的转变和极大的进步”<sup>[5]361</sup>,“不论是在解放前还是在解放后,我们历来都把知识分子放在革命联盟内,算在人民的队伍当中”,知识分子属于“劳动阶层”<sup>[5]358</sup>。陈毅还在会上明确肯定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的组成部分之一,他们是主人翁,主张以后不采取搞运动的形式进行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高度评价“科学家是我们的国宝”,并幽默地向知识分子行脱帽礼,谓之脱“资产阶级之帽”,加“工人阶级”之冕。同年,周恩来进一步指出:“我国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战线上,做出了宝贵的贡献,应当受到国家和人民的尊重。”“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积极地为社会服务,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且愿意继续进行自我改造的。毫无疑问,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我们应该信任、关心他们,使他们很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sup>[6]426</sup>“过去把知识分子包括党员在内都看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是不对的。”<sup>[7]211</sup>虽然这时候还强调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但这是在承认知识分子属于劳动人民这个前提之下提出的,与将知识分子作为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而要求其改造思想完全不同。

这样的政策对知识分子的现实地位产生了直接作用。当他们被划定为小资产阶级甚至被划定为资产阶级时,他们的生存就变得艰难起来,处于生存的波谷位置,是不被信任的被打压对象,不能正常地参与文化生产与其他的社会活动。当他们被认定为劳动人民时,他们的生存环境才能得到一些改善,处于生存的波峰位置,他们作为文化艺术生产者的地位得到承认。1960年代初的文化政策还原了知识分子本应有的创作主体身份,政策制订者意识到“要掌握政治机器”,“要掌管全部社会生产”,“需要的决不是响亮的词句,而是丰富的知识”<sup>[8]487</sup>。1960年代初经济困难,百废待兴,要想恢复经济增长,就需要知识分子的参与,这才形成了国家政权对于知识分子的征召需要,从而考虑改变过时的知识分子政策。就知识分子而言,一直备受打击,但仍然希望得到承认,形成了对于新政的期待与接受。正是这两个方面的一拍即合,促成知识分子政策的有所改变与迅速落实,使得知识分子迎来了一个时间短促但却相

对宽松的生存环境。相应的,为了恢复文化生产,当然也就放松了对于知识分子的政治束缚,从而也放松了对于文学的政治束缚,为文学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没有什么比让真正的生产者恢复生产,更加有利于整个经济与文化的复苏。这也说明,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文学与政治间的关系,文化政策主体(制订者)与政策客体(知识分子)间的关系决不是制订与服从的关系,而应当变政策客体为创作主体,给作家以创作自由,才能形成创作的繁荣局面。

## 二

1960年代初文学弱政治化的理论策略之二是,通过统编文科教材,树立学理规范,弱化对文学的政治统制。

从中国高校的教材建设来看,1949年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主要是“搬用或抄袭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解放后则“大量采用了苏联的教材(有不少是来华专家编写的),自己编写的很少”,这是另一种照搬国外教材。1958年教育革命提出后,出现了不少由年轻学生集体编写的教材,虽然“出现了一种新气象,但由于对旧遗产和老专家否定过多,青年人知识准备又很不足,加上当时一些浮夸作风,这批教材一般水平较低,大都不能继续采用”<sup>[9]143</sup>。重新编写教材,不仅是改变旧的教材使用现状,也承担了建构新的意识形态的重要使命。周扬领衔负责此项工作,表明中共高度重视这一工程。但1960年代初正是中共经济建设与思想理论的调整期,教材建设也充分体现了这一转型特征,表现为指导思想的松动与内容的开放。如周扬提出了纠正以往教材编写缺陷的办法,其一,针对缺少科学推理、偏离中国创造实践的情况,明确指出编写教材的指导思想“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sup>[9]144</sup>,但特别强调不要将马克思主义的结论作为套语,空发议论,乱贴标签,给教材编写提供了相对自由的思考空间。其二,针对以往教材中“厚今薄古”和“盲目仿外”的错误倾向,强调“注意中外古今不可偏废”<sup>[9]145</sup>。周扬认为冯至提出的“三分是新的,七分是旧的,也不算冒险”,甚至提出“二八开”<sup>[10]128</sup>,要求引进的外国知识不能局限于苏联,要特别注意“关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知识的介绍”<sup>[9]145-146</sup>。其实,亚、非、拉等国缺乏影响世界的思想资源,这里所提出的不要局限于苏联,其实就是借助掩饰悄悄打开面向欧美国家的大门。这为教材内容扩容提供了方向性意见。其三,针对以往教材说教式和霸权式言说方

式,主张赋予接受者以主体自由性,“教科书的叙述方法要力求简明生动,要有科学的论证,要有分析和比较,既能使学生发生兴趣,又让教师有补充发挥的余地”<sup>[9]146</sup>。截止到1963年,共出版教材三十种五十二本,已付印十七种二十七本。其中最受关注也最能体现这一时期文艺政策的当属文学理论教材。“新中国成立后,确立国家意识形态成为一个不亚于经济建设的重要任务,文艺学作为意识形态建设的最重要、最有效的手段之一,自然而然地必将参与到这个重大的工程中来。”<sup>[11]</sup>时至今日,马克思主义理论工程的首批书目中也赫然包括文学理论,就是这一思路的延续。

当时的文学理论教材分别是以群的《文学的基本原理》和蔡仪的《文学概论》。从目录编排的知识体系看,无论是以群本还是蔡仪本都是“五论模式”,包括本质论、发展论、作品论、创作论、鉴赏论(批评论),摆脱和超越了前苏联文论教材的“三论模式”即“本质论”、“作品论”和“发展论”。“三论模式”在第一部分确定文学的本质,探讨作为意识形态之一的文学的品质和特性以及它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任务。第二部分研究具体作品的结构,确定分析作品所应依据的原则和方法。第三部分建立分析文学发展过程所应依据的原则和方法”<sup>[12]5</sup>。1950年代中国文艺学体系基本上都由这个三论构成。1958“大跃进”期间编写的教材着重强调毛泽东的《讲话》和有关文艺问题的言论,全书贯穿毛泽东文论思想。以群和蔡仪的“五论模式”成为后来中国文艺理论教材的基本结构方式,全国第三部统编教材《文学理论教程》(童庆炳主编)采用的也是这种模式。从苏联的“三论模式”到中国的“五论模式”,增加了“创作论”与“鉴赏论(批评论)”,更加充分地重视了创作过程研究,也重视了接受研究,在这两个部分,我们更能看到创作规律与接受规律的呈现,容纳了更多的审美内容。这既是对作家作为创作主体的重视,也是对读者作为接受主体的重视。“五论模式”改变了“三论模式”只见文学本质、作品、文学史,不见作家与读者的重要偏颇。如果说“三论模式”只是所谓规律的刻板陈述,那么“五论模式”已经把规律研究与人(作家)的研究结合起来了,赋予规律以人学特征从而使得规律灵活起来。从教材编写上的“三论模式”到“五论模式”的转型,不仅丰富了文学研究的对象,也深化了文学性质的认识,强化了文学活动的人学特征。1953年,美国文艺学家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一书中提出著

名的“四要素说”,认为一个完整的文学活动是由作品、作家、世界、读者四个要素组成。以群与蔡仪的文学理论教材中虽未直接提及四要素,但从知识体系和结构上看,已多少与这“四要素说”不谋而合。这一方面说明了以、蔡两本教材的理论体系的完整性,另一方面也验证了这本教材在中国文艺理论逐步成熟发展过程中确实具有转型与标志作用。

从理论来源看,这两本教材不再像1950年代教材那样唯苏联马首是瞻,而是更多地传承中国古代文论遗产、总结当代文学实践、借鉴西方各国的理论资源。周扬指出:“教科书要编得好,理论上形成自己的体系不容易,一是要总结我们今天的经验,使之上升为理论,然后才能形成体系写入教科书,二要批判地整理自己的文化历史遗产,三要不断地吸收外来的新成就,没有这三方面的工作,就搞不出好的教科书来。”<sup>[13]332</sup>尤其是要“运用中国的文学现象来说明论点,至少要运用现有成果”<sup>[14]242</sup>。两本教材贯彻了周扬的指导思想,尤其是以群本做得更鲜明,有学者通过数据统计说明:全书中共有108个中国古代文论注释,占全书注释总量13.2%,涉及孔子、刘勰、白居易、朱熹等43位思想家的76篇/部文献。有关中国现当代文论的,共有注释166个;有关中国古代文学的,共引用12人、作品18篇/部、注释总数20个;有关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共有注释27个。这四个方面的“注释总量为321个,占全书注释总量的39.2%”<sup>[15]</sup>。对本土文学经验和理论的重视程度已经十分突出,这表明:“从西方文学理论的移植到苏联文艺学话语的模仿,中国当代文艺学在经历了两次学术转型之后,终于在60年代借助两部全国统编教材的编写而确立了独特的生产机制。”<sup>[15]</sup>这对于文学理论的中国化起到了巨大促进作用。

从言说方式看,淡化了文学艺术的政治(政策)色彩。在文学理论教材中纳入政治话语,是苏联教材的一个特点,季莫菲耶夫的《文学原理》是一个典型。著者明确指出,编写教材的目的就是要努力用苏联文学作品对民众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并且把人类储藏在文学里面的巨大的精神食粮尽量输送给最广泛的群众。这决定了教材必然运用政治主导化的言说方式和灌输式的叙述口吻,造成接受者的阅读空间狭小,文学想象受阻,思考能力弱化。1959年出版的山东大学编写的《文艺学新论》,也体现了这样的特点,全书共分七章,分别是:第一章,革命文艺在革命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二章,文艺要为什么人服务;第三章,文艺应该如何为工农兵服务;第四

章,文艺的革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第五章,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第六章,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任务和标准;第七章,党的文艺政策。<sup>[6]</sup>教材内容几乎全由当时的政治话语组成,说是《讲话》的注脚也毫不夸张。1960年代初文艺政策的调整却使文论家们可以以文论家的理论身份来探寻文学发展的规律,从而更加合理地解释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周扬曾先后五次参加文学理论教材编写讨论会,并对北京(蔡仪组)与上海(以群组)两个编写组提交的提纲做出了相关评论,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认为:“过去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讲得多,这是必要的,但文艺的特点也要讲。”<sup>[14]231</sup>在当时的语境中,这是有意松绑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打破此前的政治与艺术等同论。周扬指出:“政治仍要强调,但不能把政治与艺术……等同起来。”<sup>[14]239</sup>依据这个基调来看,以群本明确文学“不是用一个简单的公式、定义就可以解释清楚的。因为,要真正了解什么是文学,就必须从一切复杂的文学现象中,从这些文学现象同其他各种现象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中,概括出它们的共同点”<sup>[17]2-3</sup>。以群本通过绪论的四节内容归纳出文学的三个特性: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文学用形象反映社会生活、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将之概括为一句话即文学是一种以语言为载体、通过形象反映社会生活的社会意识形态。蔡仪本则进一步指出文学是反映社会生活的特殊的意识形态,即文学是一种以语言为载体、通过形象反映社会生活的特殊的意识形态。这样看来,虽然两本教材都没有指出文学之所以为文学在于其文学性,但至少已明确指出文学的构成要素离不开形象、语言这些审美规定性。在当时的高度意识形态化的语境中,不谈文学的意识形态性甚至是奇怪的。但这两个版本都有意识地将文学作品单独列出一章,以此来强调文学的发生、发展除了受外部社会生活因素的影响外,还与其自身的内部构成要素密不可分,已经属于难能可贵了。这产生的有效性是,其一,强调:“文学为政治服务是通过它本身的特点,发挥它的特殊性能和特殊作用,达到适应政治上的需要,为政治服务的目的。”“文学的特殊作用则在于它以真实、生动的艺术形象影响读者的思想感情,起潜移默化的作用。”“一部(篇)文学作品,如果没有或缺少动人的艺术形象和完善的艺术形式,那么,它就不可能成为有力的为政治服务的武器。”<sup>[17]99-100</sup>就是说,文学凭借它的艺术形象和艺术形式,在充分调动人的情感后为政治服务,而不

是依靠对政策的直接而简单的演绎来实现。其二,文学的基本原理异质于政策,“古今中外的文学实践代代相承,逐渐地累积经验,发现某些共同的规律,经过古今中外的思想家、文学评论家逐步加以总结、概括,提升为理论”<sup>[17]1</sup>。周扬就试图区分“理论”与“政策”,认为“理论教科书回答的‘是怎样’或‘不是怎样’,而不是回答‘应当’怎样和‘必须’怎样。‘是’和‘不是’对于‘应当’和‘不应当’有参考作用,但教科书不要去解决‘应当’、‘不应当’的问题。这个问题由我们的报告和党的决议去解决”<sup>[14]246</sup>。这里提出的“是”就是实事求是的“是”,指的是事物发展的规律性。反映在文论教材编写中,指的就是应当探寻文艺创作与欣赏的基本规律,而非只是满足于指出文学创作应当如何才能更好更具体地配合、服务于即时的对象,产生即时的效果。周扬甚至提出了一个大胆构想,主张将“文学概论”和“毛泽东文艺思想”分为两个不同的课程来开设,这就意味着他想结束1940年代以来这两个概念不分的混淆状态。说白了,过去习惯于用“毛泽东文艺思想”来取代“文学概论”关于文学艺术规律的完整探索与体系表述,周扬认识到了该中止这个局面,“文学概论”不应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直接对等物与翻版,作为科学的文学理论研究应当具有更为宽泛的内容与严谨的理论体系追求,而非只是全力落实具体的政治、政策而对接于当前现实。前述《文艺学新论》就是用“毛泽东文艺思想”来取代“文学概论”。后起的以群本与蔡仪本,就是将“文学概论”从“毛泽东文艺思想”中分离出来,独立成篇,专门探讨文学艺术的发展规律。此时的周扬,已经与其在延安时期形成的文艺规律就是文艺政策的思想相脱离了,虽然这还算不上彻底决裂,但有这样的脱离实属不易。受当时国家意识形态总体性的限制,周扬的这一设想肯定无法完全实现,但他的讲话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材的总体编写理路,形成了淡政治重学术的整体编写倾向,从而能够在既定的框架中积极研究文学的自身特征与构成要素。王建刚曾提出:“文艺学的‘政治化’在50年代已基本完成,60年代初期文科教材的编写只是对它的一种正向梳理与系统表述。”<sup>[18]3</sup>我们认为,这一观点忽略了1960年代文科教材编写所体现出来的期望突破1950年代樊篱的理论冲动与实践。如1959年的《文艺学新论》认为“文艺是一种上层建筑”<sup>[16]5-6</sup>,不是意识形态,这样一来,就更加紧密地将文艺与经济基础、政治直接关联起来了,以便强化文艺的阶级性与武器作用。毛泽东在《应

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中曾提出“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其中“文化”概念应当包括了文学、艺术在内，可见也是将文学视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的。但1960年代的文学理论教材强调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多少拉开了一点文学与经济基础、政治的距离，留下了一些空间来讨论文学的特殊性。

意识形态说一直影响着中国文艺理论界对于文学性质的界定，即使到了1980年代以后，这一观念仍然占有主流地位，如童庆炳的《文学理论教程》就承袭了这一理论传统，但童庆炳已经在以群的“社会意识形态”与蔡仪的“特殊的意识形态”之上，明确了文学作为意识形态的“特殊性”在于其审美性，将以群本与蔡仪本所涉及到的形象、语言、形式等文学内在构成要素提升为“审美”意识，完成了从一般的社会意识形态到特殊的意识形态再到审美意识形态的理论转型，从而增加了文学与政治关系论述的理论深度与关联的合理性。<sup>①</sup>

### 三

1960年代初文学弱政治化的另一理论策略与文化思想上的一定开放直接相关，此时通过大力译介西方文艺理论，引进学术“异端”，弱化了文学中的政治独尊。

对西方文艺理论的态度，一直是个敏感而重要的话题。审视一下1949年后的当代文论史，不难发现，文艺政策规定了西方文艺理论的接受广度与深度。周扬曾引用过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的一句话：“‘走俄国人的路’，政治上如此，文学艺术上也是如此。”<sup>[19]183</sup>这样看来，1950年代文艺理论译著集中于前苏联也就不足为奇了。其中文艺理论教材的翻译，几乎成为苏联教材的一统天下，共有蔡特金的《文艺学方法论》（任白涛译，光明书局，1950年）、阿拉伯莫维奇的《文艺论教学大纲》（曲秉诚、蒋锡金合译，东北教育出版社，1951年）、维诺格拉多夫的《新文学教程》（以群译，新文艺出版社，1952年）、季靡菲耶夫的《文学原理》（查良铮译，平明出版社，1953年）、苏联大百科全书相关内容的汇集《文学与文艺学》（缪朗山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涅陀希文的《艺术概论》（杨成寅译，朝花美术出版社，1958年）、依·萨·毕达可夫的《文艺学引论》（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译，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谢皮洛娃的《文艺学概论》（罗叶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维·波·柯尔尊的《文学概论》（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译，高等教育出版社，1959年），其中没有一本是欧美的。其他涉及文

艺学与美学的译著，主要以马、恩、列、斯、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普列汉诺夫、高尔基为对象，仅有《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波瓦洛《诗的艺术》（任典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为欧美理论作品。<sup>[20]254-350</sup>再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文艺理论译丛》上也有一些欧美文论的译文，但整体地看，还没有构成与苏联文论的平衡。

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中国开展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批判，对前苏联文论的译介也开始冷却。直到1960年代初文艺政策调整期间，周扬作为直接领导者与参与者，才再一次强调了掌握外国文化知识的重要性，只不过这一次他没有刻意强调以“俄国人”为学习榜样，而是将视域扩大为整个世界，“历来文化高涨时期都由于吸收了外来营养，隋唐是这样，‘五四’文化运动是这样，我们要有一个新的文化高潮，学术繁荣，要大量吸收外国先进东西为我所用”<sup>[21]316</sup>。各大出版社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翻译热潮。商务印书馆在1950年代开始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的计划得以实施（1958年中央确定商务印书馆出版任务为以翻译资本主义国家的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为主），翻译出版了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有柏拉图的《泰阿泰德·智术之师》、亚理士多德的《诗学》、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伽森狄的《对笛卡尔〈沉思〉的诘难》、康德的《判断力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与《美学》（第一卷）、《马恩列斯论德国古典哲学》、罗素的《心的分析》与《人类有前途吗？》、让·华尔的《存在主义简史》、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卢卡奇的《存在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M. 玻尔的《我这一代的物理学》、柏格森的《形而上学导言》、R. 加罗蒂的《人的远景（存在主义，天主教思想，马克思主义）》、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怀特的《分析的时代（20世纪的哲学家）》、杜威的《自由与文化》与《经验与自然》、宾克莱的《理想的冲突——西方社会中变化着的价值观念》等。此外，还出版了由洪谦主编的“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的“现代外国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的《存在主义哲学》，到“文革”

<sup>①</sup> 本书编写组《文学理论》中重提“文学是社会意识形态”（见《文学理论》，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5页），说明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目前还存在着分歧。

前夕,已出版二三百种之多。上海人民出版社也翻译出版了近百种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如杜威的《确定性的寻求》与《人的问题》、胡克的《历史中的英雄》与《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与《自由的矛盾情况》、莫里斯的《开放的自我》、阿克顿的《时代的幻觉》、罗素的《社会改造原理》等。人民文学出版社在1962年与上海文艺出版社就《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及其它外国文学作品选题分工问题进行协商,并具体划定各自承担的翻译书目,同年开始出版《外国古典文艺理论丛书》。人民文学出版社还于1961年开始编辑出版《古典文艺理论译丛》。以上这些西方译著在翻译质量上达到了较高的水准,在编选范围上体现了编选者的学术勇气和非凡眼光,从主要以前苏联为主扩大到当代西方各国。甚至在政治风向急速向“左”之际,在1964年至1966年间,还出版了近二十辑的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尤其重要的是,其中有很多文论资源已经被编选成为高校文科教材,产生了更加广泛的影响,如1963年由伍蠡甫主编的《西方文论选》(上、下卷,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后用作高校文科教科书,并于1979年重印,“是西方文论在中国新时期以专著形式介绍和研究的开始”<sup>[22]82</sup>。1963年还出版了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上、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作为高校美学教材使用,次年重印,1979年再次修订重印。这表明中国的文论教学再次出现真正的中西对话与交流,而非中苏对话与交流;其深度与广度也非仅仅只是中马的单一关联,而是扩展到了属于古今中外的广泛关联。

通过以上译介活动所构成的中西文论对话,是20世纪以来中西文论三次大型对话之一。第一次酝酿于五四时期,成型于1930年代;第二次是1950年代至1960年代;第三次是新时期以来。第二次又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50年代,主要借鉴前苏联和东欧文论,推动了唯物史观文艺观念的传播和普及,提高了文论在文艺活动中的地位,但政治的强势介入逐渐使其演变成政策化极强的教条主义的僵化对话模式,脱离了文学的实际;第二个阶段主要是1960年代初中期,由于此阶段恰逢文化政策调整,出现了理论声音的多声部化,一改唯苏独尊的一元格局,出现了“广开国门”、“众声喧哗”、“杂语共生”的小态势。这产生了三个积极而影响深远的效果:

其一,较为完整地呈现西方文论与美学的历史发展过程,消解了文学与政治言说上的单一性与绝

对性,具有了多样性。任何关于完整历史的叙述,其实所指向的都是多样性。历史过程绝对不是单一现象的演进过程,绝对不是单一观念的发展史,历史就是复杂性、多样性的共存。因而呈现历史,哪怕会对这种呈现加上严厉的束缚,也无法彻底消除历史本身的复杂性与多样性。所以,出现《西方文论选》与《西方美学史》,就意味着要介绍西方文论与美学史的多种多样的理论观点,而不可能只呈现一派一家的学说。就文学与政治关系来看,既应当介绍柏拉图式的将政治与艺术等同起来的看法,也应当介绍王尔德式的将政治与文学对立起来的看法。其实,朱光潜认识到了这一点:“本编的选择标准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足资借鉴,所以选择来介绍的大半是带有积极意义的经典性的论著;另一个是代表性较大,影响较深远,有助于说明历史发展的源流线索,这中间除掉正面性的东西之外,还要包括一部分反面性的东西,例如新柏拉图派和克罗齐。这些反面性的东西不仅可以当反面教员,也还可以帮助理解正面性的东西。一般地说,在过去的美学家之中,正确的思想总是在和错误的思想斗争之中才能形成的,而且正面与反面的分别也只是相对的,没有人是完全正确的,发生过深远影响的人也很少毫无可取之处的。”<sup>[23]4</sup>后来,他在1979年修改补充了这段说明:“编者对主要流派中主要代表的选择只有一条标准:代表性较大,影响较深远,公认为经典性权威,可说明历史发展线索,有积极意义,足资借鉴的才入选。反面人物也不一概排斥,古代的柏拉图,中世纪的普洛丁和托罗斯亚昆那和近代的克罗齐都是唯心主义的有反动倾向的人物,但是在美学思想发展中都起了巨大的作用,你还不能将他们一笔勾销。这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要求。正确的思想总是在和错误的思想的斗争中形成的。不懂得反面,也就难懂正面。”<sup>[24]18</sup>朱光潜虽然力图与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靠近,但为了尊重历史,仍然要呈现历史的复杂性与多样性,这就为各种学派观点的登场提供了可能性。朱光潜能够在新时期率先反思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就与其撰写西方美学史而深入思考意识形态理论有关。朱光潜在初版序论中讨论了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提到了三条意见:存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转过来影响社会存在;各种社会意识形态互相影响。<sup>[23]10</sup>其中“各种社会意识形态的互相影响”就发展成为1979年的“反对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之间划等号”的意识形态高浮论,从而松开了文学与政治的刻板关联。



这说明1960年代初的较为全面地引进西方文论,其实为反思文学与政治关系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只是由于条件的限制,这种可能性在当时还无法展示出来而已。

其二,尼采的直觉主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萨特的存在主义与人道主义等西方现代文论纷纷闯入中国视域,对于一直以马列主义为理论资源的话语语言来说,非理性的情感、直觉、深层心理、潜意识等唯心主义的“另类”、“异端”,属于“反面教员”,但也正是这些“另类”、“异端”的准入,可以看到文艺除了与政治、社会等外部要素相关联以外,也应与人的生命、情感、梦想相关联,这无疑丰富了文学与社会的关联面,扩大了文学社会性的内涵与指涉功能,由此可以确认文学与人类生命体验与情感抒发的内在关联性,这对提高文学作为人类精神活动形式的认知,是有帮助的。1950年代钱谷融提供了“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1960年代引进的西方文论思想无疑可强化这种论述,并因为尼采、弗洛伊德与萨特的思想具有鲜明的现代主义色彩,更可以将文学是人学的论述范围扩大到现代论域,实现文学是人学论述的现代转型,即从传统的人性论、情感论、人道主义状态转向现代的生命论、存在论状态。

其三,开始重视文学的审美要素和自身的形式结构问题,让人们看到了文学创作的独创性与艺术自身问题的重要性。此时翻译中包括了黑格尔《美学》第一卷(朱光潜,商务印书馆,1961年)、约翰霍华德劳逊的《戏剧与电影的剧作理论与技巧》(赵齐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61年)、亚里士多德与贺拉斯的《诗学诗艺》(罗念生译、杨周翰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爱德华杨格的《试论独创性作品》(袁可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锡德尼《为诗辩护》(钱学熙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泰纳《艺术哲学》(傅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等,也为从审美与艺术的角度研究文艺创作、定义文学性质提供了可能的理论,打破了政治言说的单一性与权威性。

西方文论的译介说明了如下几个问题:首先,这说明在文化政策调整期,思想观点是可以存异的、多元的,这个存异与多元未必就消解了主导性;其次,这说明西方文论的介入可以带来思想解放,从而改变中国文论的封闭局面,为文学与政治关系松绑起到重要作用;再次,这说明新时期以来思想解放大潮中有关审美、人性等问题的讨论并不是天外来物,其理论生长点可溯自1960年代初。1960年代初期译

著中涉及到的人道主义、审美规律性、人的生命与情感等内容,为新时期人道主义、主体性与审美自律论的异军突起提供了学理前提。在观察新时期时,人们难免会从横向的角度来看新时期的思想解放与西方思潮的引进与介入,但要看到,这样的融合其实早在1960年代初期就已经开始展露。1960年代初期所积聚的思想力量,从纵向的角度支撑了新时期文论的突破与创新。

从以上讨论中我们可以明确这样几点:第一,文学艺术发展的空间与政治制度的规约间的反比关系。从历代文学发展史看,大凡文学艺术大繁荣时期都是政治约束力相对较小的时期,如先秦时期、盛唐时代。第二,对知识分子身份的认定会直接关涉精神生产的盛衰。知识分子才是文学艺术的第一生产者,文学生产者身份的丧失也就意味着文学艺术生产和传承的中断。第三,可以改变以往对1960年代的粗浅判断,认为整个1960年代都笼罩在一片阴霾之中,没有任何理论的探讨与进步,其实新时期只是为思想解放提供了一个新的语境机缘,学理源头还得回溯到1960年代初。第四,有关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处理问题,不能简单地将两者关系实体化,即不能将这组关系中的政治现实化、政策化,一旦现实化与政策化之后,又规定文学只能为这样的现实化、政策化的政治服务,势必就要陷入“工具论”、“服务论”、“反映论”的怪圈之中而使文学失去了本质属性。

不可否认,1960年代初采取的这些理论政策的确调整了文学与政治关系,但由于当时政治对文学的直接干预并没有停止,政治标准第一仍然占有绝对优先的统治地位,使得这一时期的调整其实只是微调,只是对文学政治化的一种弱化。鉴于文学性质的说明还不能摆脱工具论的重重束缚,这样一来,既然不能建立新的认识与把握文学性质的取代机制,也就不可能更加合理地建构文学与政治的有效关系。当新时期邓小平中止文学工具论,这样的机会才真正开始出现,才有可能将文学性质的认知转移到审美论上来。我们认为,若想真正处理好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就应该先看到二者的各自独立性,再看到二者间的关联性,才能真正实现文学与政治的结合。我们认为:“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应当是一种想象关系。文学要表现政治,描写政治,在其创作中或自觉或不自觉含融政治,这都体现为文学的想象政治。”由于“处于文学想象中的政治,既可以来自现实,却又已经超越现实,与人类理想中的政治结合在一起,从而具有理想政治的特点”,因而,“文学



与政治的关联,主要不是与制度、权利与统治意义上的政治相关联,而是与作为一种人类理念与情感的政治的相关联”<sup>[25]</sup>。从这个角度再去反思,1960年代初有关文学自身问题的讨论,其局限性不言自明,那时所欲解决的是文学与现实政治即政策间的关系,还根本没有上升到文学与政治的想象关系,这注定1960年代所进行的文学与政治关系调整,还需要再思考才能向着更加深广的方向发展。

#### [参 考 文 献]

- [1] 周扬.在北京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周扬文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 [2] 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M]//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M].第1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 [4] 罗萍.1956—1966年中我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及其演变[J].攀枝花学院学报,2005,(3).
- [5] 周恩来.知识分子问题[M]//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 [6] 周恩来.不断加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根本任务[M]//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 [7] 周扬.关于百家争鸣与知识分子政策[M]//周扬文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 [8] 恩格斯.致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学生代表大会[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 [9] 周扬.关于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情况和今后工作意见的报告[M]//周扬文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10] 周扬.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编写会议上的讲话[M]//周扬文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 [11] 张旭春.文学概论:周扬与蔡仪[J].文艺争鸣,2011,(9).
- [12] 季靡菲耶夫.文学原理(第一部)[M].查良铮,译.上海:平明出版社,1953.
- [13] 周扬.关于高校教材的编写工作[M]//周扬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 [14] 周扬.对编写《文学概论》的意见[M]//周扬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 [15] 支宇.对以群主编《文学的基本原理》(1964年版)的社会学反思[J].文艺研究,2008,(9).
- [16] 山东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文艺理论教研组.文艺学新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59.
- [17] 以群.文学的基本原理(上册)[M].上海:作家出版社,1964.
- [18] 王建刚.政治形态文艺学——五十年代中国文艺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 [19] 周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国文学前进的道路[M]//周扬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 [20] 毛庆耆,董学文,杨福生.中国文艺理论百年教程[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 [21] 周扬.在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上的讲话[M]//周扬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 [22] 曾繁仁.中国新时期文艺学史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 [23]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初版编写凡例[M]//朱光潜全集.第6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0.
- [24]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再版序论[M]//朱光潜全集.第6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0.
- [25] 刘锋杰.从“从属论”到“想象论”——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新思考.文艺争鸣,2007,(5).

(责任编辑 何旺生)

### On the Theoretical Strategies and Functional Analysis of Less Politicized Literature of the Early 1960's China

YIN Chuan-lan<sup>1</sup>, LIU Feng-jie<sup>2</sup>

(1. School of Liberal Arts, Mudanjiang Teachers College, Mudanjiang 157011, China;

2. School of Liberal Arts,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215123, China)

**Abstract:** Early in the 1960s, there arose a tendency in China of literature being less politicized. The main theoretical strategies contributing to the trend included a redefinition of the class identity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a compilation of official texts of new literary theories and an introduction of various schools of theories of literature and arts, all of them helping to create a relatively tolerant and stimulating context for the exploration of the laws of literature. The innovative efforts of literary circles in the 1960s still remained as one of the enduring theoretical sources, directly affe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in the new period after 1978.

**Key words:** 1960s; less politicized literature; theoretical strategies; adjustment